

# 救活梁娅难不难

■张田勘

2 月 17 日,35 岁的 IBM 深圳公司管理  
人员梁娅倒在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 C 出口  
的台阶上。监控录像显示,在梁娅倒下后有发  
出求救的动作。3 分钟后,有市民发现并告知  
地铁工作人员。随后地铁工作人员赶到,民警  
也在 25 分钟后赶到。50 分钟后,11 时 18 分,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梁娅已经死亡。  
正值青春妙龄,生活和事业如日中天的  
梁娅突然身亡,让人唏嘘不已的同时,也产  
生了一个最大的问号:救活梁娅很难吗? 现实  
已给出的一种答案是:很难。但是,现实还有  
另一种答案:救活梁娅并不难,就看是否  
采取行动和如何采取行动。  
梁娅之死并非应验的是国人冷漠和不  
敢救助倒下的人,相反,市民、地铁员工、民

警和急救人员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只是伸出  
的援助之手不大有力,也不是很适宜,才导  
致了悲剧的发生。  
急救医学的大量实践证明,挽救生命有  
一个“白金 10 分钟”的理念。4 分钟内进行心  
肺复苏者,有一半的人能被救活;4 分钟至 6  
分钟开始进行心肺复苏者,仅 10%的人可以  
救活; 而 10 分钟以上才开始进行心肺复苏  
者,几乎没有人能存活。梁娅之死,很大程度  
上缘于她未能在 10 分钟内得到有效救治。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地铁员工和地铁站  
内的服务人员都要进行外伤包扎、心肺复苏  
等基本急救训练,并且能对常见急症进行现  
场初步处理,对患者进行通气、止血、包扎、  
骨折固定等初步救治,搬运、护送患者、现场  
心肺复苏,以及在现场指导群众自救、互救  
等相关辅助医疗救护。

遗憾的是,在国内地铁和其他公共服务  
设施逐渐普及和增多的同时,员工的急救知  
识和技能却没有同步配套。在梁娅事件中,  
尽管地铁员工报了警,但未采取任何急救措  
施,也不敢上前动她,只能蹲在身边询问是  
否需要帮助。  
在这方面,国内也有少数地方的地铁做  
得比较好。比如成都地铁站内的服务人员都  
进行过外伤包扎、心肺复苏等基本急救训  
练,2012 年 12 月 18 日, 成都地铁华西坝站  
值班站长熊玉兰接到一名 20 多岁女子晕倒  
的报告,立即和同事赶到现场,协助保安一  
起将晕倒的女子扶到站内椅子上休息。了解  
了女子情况后,熊玉兰拿出急救箱,找来一  
支葡萄糖和着热水让女子喝下, 大约 10 分  
钟,女子脸色恢复正常。稍事休息,女子便继  
续坐地铁走了。

梁娅的情况更复杂和困难一些,因为她  
已经不能说话,但从其手提袋中有一个装着  
牛奶的保温杯、六块小蛋糕、一根香蕉和一  
袋圣女果,可以推知她没吃早餐,可能是因  
低血糖而头晕摔倒。这时如果把梁娅扶起  
来,拍拍背和掐人中,用梁娅自带的牛奶喂  
她或喂点糖水,她就可能缓过来。急救医学  
实践证明,在院前急救工作中,只有 20%是  
真正危重的病人,另外的 80%都是很简单的  
问题,有的病人甚至不需要任何处理。  
据上海地铁统计,超过 70%的晕倒乘客  
属于“不吃早饭族”,其中不乏年轻力壮的小  
伙子。由于一大早缺乏能量摄入,乘客容易  
在早高峰挤地铁时恶心、心悸和晕倒。要让  
救活梁娅们变得容易,须有自救和他救的配  
合。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也属于他人,尤其  
是亲人。

## 假离婚

画中有话

■文/言者 图/春鸣

安徽宁国市一对夫妇前往政务服务中心咨询夫妻房产  
过户手续,不料房产局工作人员竟建议其假离婚。“到公证处  
开证明,还要花钱才给你办。你办个离婚证最简单,8 元钱给  
你办好,等这个证办下来后,再花 8 元钱办复婚,多简单的  
事。”目前,该办事员已被解聘。  
夫妻房产过户,办证人员竟然“好心”建议市民去假离  
婚,个中荒唐逻辑,看似匪夷所思,却发人深省。刻假章,办假  
证,这是民间的灰色地带。吃这碗饭的人,大多隐身于市井街  
巷,少有敢正大光明招揽生意的,毕竟,都知这饭碗来路不  
正。然而,专事房产办证的公职人员,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引以  
为捷径,真是劣币驱逐良币之典范!假作真时真亦假,当假证  
泛滥,甚而充斥于公堂,人们的是非界线就变得模糊混淆,什  
么廉耻正义感都会扭曲,这实在是当下社会的一大悲剧。



## 让老人免费坐出租 管制需破除

言者有意

■杨中旭

2 月的最后一天, 打车软件公司快的宣  
布关爱老人计划,将在北京试点包下 5 辆  
车,安装一部 400 电话,50 岁以上的老人有出行  
需求可以免费接送。试点顺利的话,快的还  
将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推广。  
消息一出,质疑的声音紧随而来。道理明  
摆着,北京常住人口超过 2000 万,50 岁以上  
的人有数百万之多。以北京之大,人口之多,  
区区 5 辆关爱老人的出租车,显然杯水车薪。  
而且,让老人免费乘坐出租车,是再发达的  
国家也未曾有过的社会福利。快的只是一  
家赚取利润的商业公司, 缘何要制造这样  
一个噱头?

快的此举,系不得已而为之。快的和嘀  
嘀等打车软件上线以来,非议不断。非议之  
一便是,不使用打车软件、对 APP 缺少了  
解的人群,岂非打车越来越难?即使是快的  
所有者马云,也曾发出母亲“打车难”的慨  
叹。

可是,“打车难”,能怪打车软件吗?  
我第一次打车,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读高  
中时期,父亲付了 15 元车费。彼时,父亲月  
工资 400 元左右。如果再倒退 10 年,他的  
月工资只有区区 62 元,根本没有经济能力  
打车。  
现在,中国内地人均 GDP 逼近 6800 美  
元,一线城市的收入更高,打得起车的人  
群非常庞大。出租车行业垄断乱象存在  
多年,面对不断上涨的需求,职能部门却  
鲜有放开市场的政策出台。通常,所谓  
的出租车新政,只是简单提价了之。新政  
寄望于车费上涨之后,部分人群被挤出  
打车市场,打车难自然缓解。

孰料,这种短期办法,从去年春夏之交  
开始,遭遇了打车软件的阻击。和盘查存  
量的余额宝一样,打车软件降低了出租  
车的空驶率,无形中扩大了出租车的供  
给。同时,打车软件公司补贴消费者和  
的哥的举措, 消解了车费上涨的挤出效  
应。在供需两端都有上涨的情况下,“打  
车难”持续发酵。和之前矛头更多指向  
出租车公司及政府不同,这一次,高调进  
入这一市场的打车软件公司背上了黑  
锅。换言之,扳子拍错了对象。

作为在市场上嗷嗷待哺的商业组织,除  
了制造公益的噱头挽回名声,又能有什么  
辙?真正有辙的,是肩负公共服务职能的  
政府。要想辙,首先就要斩断部门利益。  
有台湾朋友介绍,每晚 9 点以后,台北街  
头很少再有出租车,人们出行全靠电召,  
且电召出行便宜。因为电召降低了空驶  
率, 的哥愿意给消费者打折。

反观大陆电召平台,普遍对消费者加  
价,与打车软件公司尊重市场规律的举  
措背道而驰。不仅如此,最近,沿海某  
一线城市电召平台还要“招安”打车软  
件,其行政垄断的部门利益可见一斑。  
如果不当管制的部门利益不除,开放  
市场自然又从何说起?

## 从“命案必破”到“命案不错”是进步

■晏扬

在河南省公安厅日前下发的通知中,  
特别要求全省公安机关在案件侦破中  
强化证据意识,确保“命案一起都不能  
错”,该通知并没有要求公安机关“命  
案必破”。从“命案必破”到“命案  
不错”,这一转变受到了法律专家的  
好评。  
公安机关肩负着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的使命,这个使命光荣而艰巨。当  
民众的生命遭受戕害,公安机关想方设  
法尽早破案并力求“命案必破”, 这  
本是使命感、责任感的体现,旨在变压  
力为动力,初衷良好。然而,刑侦自有  
刑侦的规律,“命案必破”听起来激动  
人心,实际上并不科学。而在破案指标  
的压力下,一些公安机

关难免采取刑讯逼供、弄虚作假等手  
段制造冤假错案, 致使结果与初衷背道  
而驰——“命案必破”是为了打击犯  
罪,“不放过一个坏人”,可冤假错案  
接连出现,不仅让一些“坏人”逃脱  
法网,而且让不少无辜者蒙受不白之  
冤,相当于给社会、民众造成二次伤  
害。如此“破案”不如不破案,这样  
的“命案必破”宁可不要。  
河南省公安厅要求“命案不错”,同  
时不再要求“命案必破”,其潜台词  
是:无论有没有把坏人抓获,首先要保  
证“不冤枉一个好人”。这样的转变  
既是对刑侦科学规律的尊重,也是对  
民众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的尊重;既  
是防止刑讯逼供、杜绝冤假错案之  
必须,也是落实“无罪推定”、“疑  
罪从无”法律规定之必须。在这个要  
求下,

公安机关的破案率可能会下降,政绩  
上似乎不太光鲜,但换个角度看,杜  
绝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不也正是公  
安机关重要的政绩吗? 2011 年,河  
南省命案侦破率达到 97.57%,连续  
7 年位居全国第一,可是,一个赵作  
海冤案就足以让这个政绩黯然失色。

去年 5 月 6 日, 最高人民法院常  
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指出:“要像防  
范洪水猛兽一样防范冤假错案,宁  
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  
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  
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  
天就塌下来了。”这是对我国司法  
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是振聋  
发聩之言,“宁可错放也不可错  
判”、“命案一起都不能错”理当  
成为一条基本的司法准则。

## “小升初新政”能否带来教育公平

■江南一木

教育部颁发了“小升初新政”后,随  
着新学期的开始,各地都在相继研究  
落地措施,教育部又发布了将对 19  
个重点城市进行督导的消息。一时  
间,“小升初”政策的走向吸引了  
亿万家长和学生的眼光。  
“上名校难”、“读名校贵”,是  
义务教育广为社会诟病的一大顽疾,  
以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  
要破解择校难题,并把此作为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改革突破  
口。政策的字里行间处处显示出教  
育部治乱的决心,但是,“新政”是  
否真的能破解择校难题、促进教育  
公平?

“新政”行政“一刀切式”的“就近  
免试入学”,初衷是为了公平,但同时  
也固化了“学区决定论”,到哪儿上  
学、上什么样的学,全依学生的出生  
或户籍或居住地定终身;不允许学  
校有择生的权利,实际上也剥夺了  
学生正当的择校权利;限制特长生,  
意在管制教育的异化、招生的腐败,  
也限制了学生的多样化发展,更易  
固化“千校一面”格局;要求民办  
学校免试招生,是行政权力对教育  
市场的不当干预,既有悖于《民办  
教育促进法》,也让其在现实中根  
本无法操作。  
这样的“新政”其实是一厢情愿地  
以不给择校的机会、权利去回避现  
实中的择校难题,是一种消极的管  
理方式。实际上,在社会

流动性强、利益诉求多样化的今天,  
择校现象显然远非一个“限”字了  
得的,禁择校的结果,将使更多人  
不惜代价去抢购学区房。  
之所以会出现前述的悖论,根源  
在于教育行政部门履职的错位、越  
位、不到位;政校不分、以政代校。  
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居高不下,  
根源在于教育部门主导下形成的  
校际间的巨大差距。社会愿望和  
教育规律其实并不一味排斥一定  
比例的择校,大家真正痛恨的是  
择校过程的不透明、不平等、不  
公平。毕竟,择校既是一种现实需  
求,也是学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教  
育行政部门既要履行好自身“有  
教无类”、确保教育公平的职责,  
也要给学校“因材施教”、落实  
以学生为本理念创造空间。